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

章冠博^{1,2}

1. 郑州轻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2. 郑州轻工业大学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创立和发展是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共同推动的结果,体现了时代要求,凸显了逻辑必然。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和发展道路的基础和前提,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生成的理论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新时代党的文化理论创新以坚实的历史根基和文化根脉,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生成的历史滋养;我们党领导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历程为新时代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智慧和力量,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生成的重要源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更植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是对实践问题的回应和解决,也是对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和概括,经受了实践检验,彰显了真理力量。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经验;实践

中图分类号:G112;A81;D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6.01.003

文章编号:2096-9864(2026)01-0016-09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伟大的实践孕育着伟大的理论,围绕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会议之密集、涵盖领域之全面、论述内容之深刻,在党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既有理论观点的创新和突破,也有工作布局上的具体要求,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自202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概念后,学界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不断深化对这一问题的学理化阐释,推出了许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围绕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发展

问题,学界主要形成了“两重逻辑说”“三重逻辑说”等观点,前者着重从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两个维度进行阐述,后者则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现实逻辑三个维度展开。也有研究成果从特定角度切入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发展,如从人民立场,将这一思想的形成发展归为“根植于人民”“聚焦于人民”“造福于人民”。已有研究成果虽充分关注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问题,但专门围绕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还不多见。鉴于此,本文拟从理论根基、历史滋养、重要源泉和实践基础四个方面,探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以深化对该问题的理论研究。

收稿日期:2025-02-11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22CKS054)

作者简介:章冠博(1988—),女,河南省淅川县人,郑州轻工业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社会思潮。

一、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基石和精神支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真经”，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追求，构成了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成为复杂斗争中保持战略定力的精神支柱。推动党的理论创新必须讲新话，但决不能丢掉老祖宗，必须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不能犯颠覆性错误。毋庸置疑，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标志，但是，其中也蕴藏着对马克思主义之“正”的坚守，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观察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问题，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础和前提，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和发展道路的理论根基。

马克思恩格斯尽管没有专门聚焦于文化现象，但是在其思想发展和理论创立过程中深入论及相关文化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学说中，是包含着关于文化的大量论述和丰富思想的^[1]。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深度解析文化本质与历史演进规律提供了方法论原则，使得对于文化奥秘的科学透视成为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揭示出文化产生的源泉在人的物质实践活动中，文化生产被还原到物质生产发展过程，并被视为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生产力的一切增长”^[2]。他们也认识到文化对

于经济基础的作用以及作为一种生产力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3]。对于文化的特性，马克思恩格斯概括出阶级性、世界性、民族性、时代性、发展性，并强调文化的发展必须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这些关于文化问题认识的科学方法和论断，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理论原点，也成为共产党人结合具体国情和时代发展进行文化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

1.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科学方法

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只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能穿透表面把握其内在的、深层次的发展规律，进而将共产党人对于文化建设的认识提升到更高水平。从“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4]^[47]，到“把文化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5]^[4]，再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6]，体现了新时代我们党对文化工作地位和作用的科学研判。这些论断之所以能够准确地把握文化工作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的战略地位，就在于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观察分析文化事业发展和文化建设问题，按照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的理论观点，将文化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联系起来加以认识和把握。“事必有法，然后可成。”随着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朝着更深层次、更广阔领域稳步推进，提升把握事业发展态势的辩证思维能力愈发显得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分析文化事业发展、文化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时，决不能孤立地、片面地、静止地理解和分析，而应该始终坚持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围绕如何推动文化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九个

坚持”、在2023年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概括出“十四个强调”、在2023年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中强调了“七个着力”，凸显了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动态发展的整体，始终坚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

2.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守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价值立场

对于文化事业而言，为谁发声、代表谁的利益绝非无足轻重的小问题，而是事关根本的大问题。从实践上看，改革开放以来文艺领域所出现的一些乱象，归根结底是价值观出现了偏差和位移所导致的。从理论上讲，价值立场问题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理论区别于其他性质文化事业和理论的根本标志。在领导文化事业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7]857}。正是基于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内容与形式辩证关系维度阐述了价值立场在文化产品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对文艺来讲，思想和价值观念是灵魂，一切表现形式都是表达一定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载体。离开了一定思想和价值观念，再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也是苍白无力的”^{[4]538}。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文化究其本质而言就是人民的文化、为了人民的文化，无产阶级政党推进文化理论和实践发展必须始终坚守人民的价值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文化创作和建设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作为文化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化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化作品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化工作者的天职。

3. 习近平文化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丰富内容

在推动新时代党的文化理论创新和文化强国建设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问题的本

质性认识和文化经验的系统性总结被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在新闻舆论工作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闻观是新闻舆论工作的灵魂，只有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才能够挺起精神脊梁，“要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定盘星’”^{[4]454}；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的资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增量”^{[4]479}。“坚持”绝不意味着守着已有的认识不动，守株待兔、刻舟求剑，只有在发展中才能实现更好的坚持。以意识形态工作来看，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得工作格局、工作态势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调整和变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曾遇见和预料到的。围绕这些新问题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把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置于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的位置，强调要积极认识、学习和掌握网络传播、网络斗争的规律，全面提升用网、管网、治网的水平，着力构建天朗气清的网络空间，持续激发网络在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方面的潜在效能，真正使网络成为推动我们各项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不仅在网络意识形态问题上，也在文化建设其他一系列问题上，习近平文化思想都包含着理论观点上的新突破、工作布局上的新举措，标志着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上的新高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的新境界。

二、历史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和传承

只有植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党的创新理论才能根深叶茂，才会有不竭源泉。回顾

百余年历史进程,尽管在过往的每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各项方针政策和推动党的理论创新时都蕴含或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却并未明确系统地阐明其在党的理论创新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理论命题,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和文化基因,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脉”,必须始终加以坚守。“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彰显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时代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本土化的理解和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也标志着我们党在推动党的理论创新发展过程中自觉地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能力跃升至新境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充分运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其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更是以高度的自信积极吸收我国悠久历史的智慧养分、撷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深厚积淀和丰硕成果,赋予新时代党的文化理论创新坚实的历史根基和文化根脉,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创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历史滋养。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重要主题

如何科学认识和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不啻是任何文化理论创新中的重大命题。就任何民族任何时期而言,特定社会形态的文化从来不是单一的成分,而是多种文化成分共存的系统,既有代表着更高社会形态的先进文化,也有反映着统治阶级利益诉求、占据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还有先前物质生产方式创造并留下的思想文化。社会文化的发展并不表现为单向度的线性演进,先进的思想文化是充分汲取以往思想文化中积极因素的

结果,现存的思想文化也离不开对于过往思想文化因素的再加工再创造,而过往的思想文化因素又会作为新思想文化重要构成因素推动社会发展。因此,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的关系绝不是简单的否定和替代关系,而是基于文化发展规律对于不同文化成分与社会生产发展之间关系准确研判的结果,是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命题。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这一问题更为艰巨、更为复杂,因为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遗产是任何一种文明都难以企及的,“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8]。

毋庸置疑,在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妥善处理和尊重不同国家、民族的文明多样性,以及正确看待并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是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围绕正确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等一系列重要讲话中予以关注和论述:从明确提出“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4]281},到提出文化自信从而将“三个自信”拓展为“四个自信”;从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首次明确强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9]483},到党的二十大对“两个结合”进行专章论述;从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概括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到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10]。就此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于习近平文化思想创立发展的全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论断新观点新举措,既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规划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相融相通的具体方法和路径,不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文化传统和文化现实的认识

达到了新高度,而且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民族性、时代性、发展性的思想认识。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国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11]315}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丰富发展,更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既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也创造了辉煌的精神文明,这些精神文明如同一部生动的历史长卷,生动呈现了一代代中国人在过往五千多年的接续奋斗中进行精神探索、理性思辨实践所孕育的丰硕文化成果。这些文化成果不仅仅是作为过往已发生事实的总结,还具有更加深远的影响和意义,它们清晰地折射出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精神憧憬和追求,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已经在经年累月的积淀中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精神基因。这些文化基因广泛渗透于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深刻影响着他们的生产与实践活动,成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在推动文化理论的创新和创造过程中,只有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才能厚植理论的历史根基和文化根脉。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中,中华文明所蕴含的精神基因和价值观念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承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积淀形成的精神品质,更通过凝练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的价值诉求,构建起当代中国社会评判是非善恶的根本尺度和精神坐标,展现出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化的独特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强调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充分发挥好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价值观念的作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关键之所在,也是将其与西方所宣扬的“普世价值”区别开来的内在标识之所在。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不仅应充分关注文化发展的普遍性,建设与现代化事业相适应的精神文明,而且应充分关注文化发展的民族性,立足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中所积淀的文明成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滋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发展,使二者真正做到交融相长、相映生辉^[12]。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辩证统一关系,二者在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互动共生的有机整体。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在现代化进程中被激活并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现代化进程也因中华文化基因的注入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巩固了文化主体性。

三、重要源泉:党领导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经验的总结和汲取

在百余年奋进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高度重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我们党从起根发芽时就是从宣传工作做起……宣传工作就是一切革命工作的粮草,革命工作没有宣传是不行的。一切工作都离不开宣传”^[13]。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使得“唤起工农千百万”成为可能和现实;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使得“敢教日月换新天”充满强劲的精神和动力;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使得“东方风来满眼春”有了正确的方向和保障。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与

党的事业的发展同频共振,始终服务于党在各个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在极端困境中发展壮大、在风雷激荡中无畏前行、在攻坚克难中取得胜利,积累形成了深刻的历史经验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11]545}在推动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业发展和理论创新中,应自觉主动地运用历史思维,注重从党领导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1. 党领导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形成的理论内容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创立发展的理论起点

随着革命和建设实践活动的深入展开,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形成了愈发清晰的认识。在革命年代,毛泽东认识到文化战线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要力量之一,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中存在着“文武两条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而要战胜敌人“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7]847}。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14]。之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八大报告也都进一步强调了文化的重要性,将其视为综合国力提升的重要标志、获取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这些重要认识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并与时俱进地推进文化思想创新的理论逻辑的起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5]147},到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9]33},再到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6],一以贯之地坚持了党在领

导文化建设中所积累的基本认识和判断。

同时,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围绕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所结出的理论硕果奠定了新时代党认识和推动文化强国建设的基本架构。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关于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关于文化建设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关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思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以及关于“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思想,不仅对于破解当时文化发展中的难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也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和分析文化建设的重要理论工具。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将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实践中所形成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概括为“九个坚持”,其中“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在关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鲜明地体现了文化“二为”方向,“坚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坚持发展了文化“走出去”战略。

2. 党领导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积累的历史经验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创立发展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来之不易、弥足珍贵,是做好今后工作的重要遵循”^{[4]149}。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历程,积累形成了深刻的历史经验,不仅揭示了我们过往为什么能够成功,而且也蕴藏着我们今后如何成功的奥秘。百余年来,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始终高扬伟大旗帜,坚持不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动中国人民从精神上的被动走

向完全主动;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不懈地把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推动革命建设改革从胜利走向胜利;始终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不懈地以人民为中心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推动我国文化事业从极度落后走向繁荣兴盛;始终坚守精神家园,坚持不懈地提升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推动中华民族精神大厦走向巍然耸立;始终放眼当今世界,坚持不懈地争取和塑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始终把握时代脉搏,坚持不懈地把改革创新作为永恒主题和不竭动力,推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从成长走向成熟。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动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守正创新,把我们党过往领导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所取得的历史经验总结好、运用好。这些历史经验不仅在实践发展中得以坚守,而且还在理论创新中得以汲取,被有机地融入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概括出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这五个方面紧密联系、内在统一,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标定了文化建设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新坐标,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文化事业发展新局面的根本要求。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并非凭空得出的,既是对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实践的生动总结,也是对过往历史经验的承继,始终高扬伟大旗帜、围绕中心和服务大局、坚守精神家园、坚定文化自信、放眼当今世界的相关要求鲜明地体现在五个方面内容中,而新时代党的文化事业发展和文化理论创新本身就是始终把握时代脉搏的直接体现。

四、实践基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推动和孕育

思想的每一次飞跃,总伴随着理论和实践

的相互激荡、共进同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内蕴着强烈的问题意识、鲜明的实践导向,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是在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中丰富发展的,是在推动实践、指导实践中成熟完善的,是经过实践检验、富有实践伟力的强大思想武器。

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的实践问题推动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发展形成

问题是理论创新的引擎,理论正是在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过程中实现更新与发展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重大成就背后也存在一系列亟待关注的重大问题和挑战:在意识形态领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4]4};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15];在文艺工作领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16]9};在思想道德领域,“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16]22};在网络空间领域,“网络舆论乱象丛生,严重影响人们思想和社会舆论环境”^{[4]4-5};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领域,“西方主要媒体左右着世界舆论,我们往往有理说不出,或者说了传不开”^[17];等等。这些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也是制约广大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实现的突出问题。在谋篇布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聚焦于这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把问题作

为研究制定政策的起点,把着力点放在破解制约文化事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上,全面分析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问题的表象和成因,深刻揭示了破解难题和推动发展之道。特别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立足于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的要求,充分认识到文化工作兼具产业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强调以体制机制改革为抓手,着手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加快完善遵循文化发展规律、有利于激发活力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

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积累的实践经验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要内容

善于总结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并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推动理论创新的重要法宝。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新时代文化建设提出的创新性理论体系,既包含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又涵盖对文化实践路径的系统谋划。这一思想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指导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行动纲领,为新时代文化创新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十八大以来,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指导思想与理论武装相同步,在深入学习、全面理解、切实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方面持续发力,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广泛开展面向人民群众的教育工作,为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坚实思想引领。我们党在新时代文化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深深扎根于人民心间,切实转化为社会大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有力思想武器,推动各项事业稳步前行;始终坚持文化建设与党和国家发展的中心任务相锚

定,坚决把握正确的舆论方向,积极弘扬主旋律,汇聚正能量,以激发全党全国人民的斗志与激情,凝聚共识,齐心协力,共同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目标奋勇前行;始终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道德层次和文明素质,坚持立德树人,培养能够肩负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始终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结合,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同时传承革命文化的精髓,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激发全民族在文化领域的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始终坚持国内宣传与国际传播相协同,加强并优化国际传播策略,生动讲好中国故事、精准传递中国声音;等等。以上这些经验不仅是破解问题之道,更经受了实践的检验,蕴含着我们党对于新发展阶段文化事业的规律性认识,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

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取得的实践成就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形成积极健康向上向好的态势,正本清源的任务取得重大成效,自觉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任务: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全面加强,党的理论创新全面推进,主流思想舆论不断巩固壮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广泛弘扬,文艺创作持续繁荣,互联网建设管理运用不断完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四个意识”更加鲜明、“四个自信”更加坚定、“两个维护”更加坚决。这些历史性成就的取得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引,“党的十八大以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最根本就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

引”^[6]。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是对历史的深刻洞察,更是对未来的鲜明昭示,应切实将这一思想贯彻落实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继续在新起点上加快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

参考文献:

- [1] 何中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历史演进[J].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论丛,2021(1):35-75.
- [2] 马克思,恩格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7.
-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49.
- [4]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5] 习近平.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 [6] 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N].人民日报,2023-10-09(01).
- [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8]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4-11.
- [9]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10] 习近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J].求是,2023(20):4-9.
- [1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12] 陈鑫.理论、历史、现实:准确把握“两个结合”的三重维度[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4(3):19-26.
- [13] 邓小平.邓小平文集:1949—1974年(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90.
- [1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67.
- [15]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29.
- [16]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97.

[责任编辑:毛丽娜 聂海杰]



引用格式:章冠博.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27(1):16-24.